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范式危机： 美国学界的论争及其反思

李 松

摘 要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欧洲和北美学界在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掀起的理论革命强烈冲击了原有的文学研究模式,深刻影响了人文学术的版图以及学术体制的变革。1993 年刘康等学者在美国《近代中国》杂志发起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范式危机的论争,集中反映了美国的中国学内部关于文学研究的方法论冲突以及人文学科之间的断裂与调整。该论争的主要话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与西方左翼的比较研究、文学的政治属性、西方文论的中国问题、人文学科关系的断裂、批评理论与新批评的矛盾以及文学研究与理论的关系。回顾与反思美国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内在逻辑及其分歧,可以为国内的文学研究者打开国际对话的窗口,并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新的思想语境中继续深化有关核心命题的探索。

关键词 比较文学;现代文学;新批评;范式;中国学;文论

中图分类号 I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0)05-0070-1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2&ZD166);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学术团队发展计划(1102-413100047)

1990 年代,美国重要的中国学杂志《近代中国》(*Modern China*)分别在 1991、1993 和 1998 年就中国研究的范式危机组织过三次专题讨论,其中两次是黄宗智发起的中国历史研究范式的对话^①;另外一次是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及其理论问题,发起者是比较文学学者刘康。刘康 1993 年在该刊发表的《政治,批评范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反思》一文在美国学界激起了巨大反响。参与者包括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杜迈克(Michael S. Duke)、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张隆溪以及普林斯顿大学的林培瑞(Perry Link)。刘康等学者就这次学术争鸣提出的经典命题后来在国际学界产生了长久的回响,周蕾(Rey Chow)、奚密(Michelle Yeh)、张隆溪、孙康宜(Kang-i Sun Chang)和张英进^②等大批学者不断就其中的相关话题进行讨论,衍生出了许多深刻的洞见。

张英进对此次争论背景与议题进行了回顾,他认为争论的重点是西方理论与中国经验的关系,争论的缘起与全球化时代美国整体学术生态的变迁有关。“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从来就不只是一种声音或谱系,它有着与欧美人文研究界整体范式转型类似的机构发展轨迹。”这次争鸣产生的直接结果,“其意义是批评理论与人文价值的分道扬镳”^[1]。张英进主张从整体的宏观视野观照具体的学术事件:“不必将文学争论当作只是个别学者的自我主张,而应该从更高的视角来把握文学争论背后所显现的学术研究

^① 其议题主要包括: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此次争辩的问题后来集结为《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全书汇集了杜赞奇、周锡瑞、魏斐德、罗威廉等 9 位国外学者对后现代主义、历史学理论和实践等方面的思考。

^② 张英进将此次论争视为海外现代中国文学界三次激烈思想交锋之一,另外两次分别是:1960 年代初夏志清与普实克(Jaroslav Prusek)关于文学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的论辩,2007 年史书美与鲁晓鹏关于华语语系文学的定义与地缘文化政治的争论。

的范式变迁, 因为文学研究从来就是一个机构型的运转体制, 其发展脉络受制于更大的文化与政治场域。”^[1]既然这一论争事件标志着国际范围内人文科学的范式转换, 那么危机时刻的思想争鸣在今天有什么学术价值? 如何从论争中获得思想智慧? 如何从范式断裂处重新思考中西学术的跨文化对话? 为了更深入地理解此次文学理论论争, 有必要考察其缘起、焦点是什么, 争论的对话性结论以及后续影响。

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范式危机

本文围绕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范式危机进行详细的剖析, 试图阐明理论的焦虑如何影响了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美国的中国研究。1993 年《近代中国》杂志围绕文学范式危机展开的争论展现了不同族裔、专业、立场与学术传统的学者对于如何阐释中国、如何理解文学的政治属性、如何在解构之后再重构文学理论新范式的种种思考, 展现了多元并存、众声喧哗的话语格局。笔者将在分析范式危机理论背景的前提之下, 梳理应对这一危机的可能出路。

(一) 范式危机的理论背景

本文所指的范式危机 (Paradigm Crisis) 是指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国理论在内的欧洲批评理论同英美新批评在文学研究方法上的对立与分歧, 并且因此而致文学观念、批评方法的分道扬镳。这种文学理论的范式危机, 一方面对源自欧洲汉学传统的美国汉学 (sinology) 和中国学 (China studies) 研究产生了重大冲击, 另一方面也刺激了美国学界的华裔学者对美国的中国学研究现状进行批判性反思。

第一, 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缺乏批判性反思。刘康认为, 当时美国学术界关于后现代主义文化和文化研究的争论中出现了两种主要的思想倾向: “一种是将人文学科的主题从根本上历史化, 包括语言、文化、文学和艺术; 另一种是把批判研究转向自身, 质疑和批判自己的范式、前提和基本假设。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 历史主义思潮在国内外都有很强的发展势头。但直到最近, 西方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还很少受到当代文学批评本身的理论争论的影响。尽管近年来出现了一些用当代理论来分析中国现代文学文本的文章, 但理论自我评价仍然很少。”^[2]在此刘康提出的尖锐问题是, 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者应该对长久以来运用的批评方法进行自觉的自我反思与批判, 从而发现认识误区和自我矛盾。

第二, 美国学者中国研究的西方中心论偏见。美国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在学术界虽然取得了与汉学同等的地位, 但是有待于走出汉学思维范式。“的确, 西方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 在与经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主导的汉学学术霸权进行了几十年的艰苦斗争之后, 直到最近才被承认为一个独立的领域。而在这样的背景下, 西方学术领域经过多年的变迁而成。一个核心的变化是, 该领域的学术不再是少数几个中国西方专家或学生的独角戏。”^[2]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美两国的思想文化交流通过学术会议、访问研究、留学生培养等方面的密切合作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为现代中国文学学科地位的上升提供了学术平台与师资力量。“具有批评理论和比较文学背景的年轻学者的出现, 都有助于一个更活跃、更多样化的事业的发展, 这个事业具有更广阔的视野, 对知识界产生了更大的影响。”^[2]刘康、张隆溪、刘禾等大批华裔学者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到美国名校获得比较文学博士学位之后取得大学教职, 至今这批学者依然是美国学界华人学者在人文学科领域的重要代表。然而, 刘康同时也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表示巨大的隐忧: “这种交流和对话也促使西方评论家对他们自己的批评论点和前提提出质疑。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一旦批评性审查的压力开始转向他们自己, 西方批评人士通常给予反方的严厉指责和蔑视, 几乎就烟消云散了。”^[2]他十分尖锐地指出, 有些西方学者的中国学研究难以走出西方中心论的偏见, 缺乏超越自我身份的质疑和反思。

第三, 形式主义、浪漫主义和历史主义研究方法的缺陷。20 世纪 80 年代末, 学界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和文学的全球辩论将注意力集中在传统学科的边缘以及相关的边缘领域, 如“第三世界”、少数群体、妇

女和“次等公民”^①。政治作为操控、塑造知识与学术形构及其传播的外部机制,其运作逻辑与模式已成为辩论的中心议题之一。“因此,反思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出现的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而这些问题只是整个制度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在当前的后现代主义争论中受到了更严格的审视。如果不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话语的各个方面,特别是政治方面进行全面的思考,我们就不可能确切地了解这一特定话语在当代全球辩论中的地位。”^[2]基于上述思想批判的前提,刘康从批评理论出发,重点介绍了几种不同批评范式的代表性成果,即三位权威学者提出的形式主义、浪漫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批评方法(分别针对的是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哈佛大学李欧梵和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普实克的学术观点),并指出每种批评范式在历史和思想方面的局限性。刘康认为,美学和政治的关系问题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固有的老话题,这个问题涉及代表和解释文化与文学的凝聚力原则这一普遍问题。换句话说,核心问题不再是文学批评的内在范式和外范式哪个更有利,关键在于这一领域的基本概念已经出现了问题。

(二)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与西方左翼的比较研究

20世纪80年代国内关于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争论一直占据知识界的中心地位。总体倾向来看,大多数学人走出了极左思维模式,开放地吸收了西方几千年来文学思想成果。刘康从平行比较的角度提出,在西方后毛泽东时代,福柯与毛泽东的观点之间形成了某种思想关联。“毛泽东的政治与美学之间的关系概念实际上可能激发了福柯西方自由人文主义的激进的批判。毛泽东从政治战略和权力斗争的角度来考虑这些问题,无疑使他的观点倾向于压制性的文化政策。但这并没有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政治总是以各种形式渗透到每一种文化形态和制度之中。”^[2]正是基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所具有的国际对话的价值,刘康希望改变中国作为理论倾销国的固有格局,从平行比较或者影响比较的角度来重审全球范围的左派理论。“从本质上看,我们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和左翼文学实践的外部视角还能在多大程度上受益?对马克思主义文学传统的研究很多,然而,有多少人真正以自己的方式接触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他认为,应该把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思想与法兰克福批判理论学派、其他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一般的当代理论所发展的理论立场联系起来进行比较。如果说国际学界缺少中国声音的话,“缺乏对话往往是由于我们缺乏准备,无法接受我们自己的思维方式无法立即理解的关键术语。美学问题一直是中国现代作家和评论家关注的焦点,但中国现代文学中关于美学的讨论,更不用说后现代主义争论中美学问题的更新版本,在西方仍然是罕见的”^[2]。刘康对西方文论的接受不再是被动的、单向直线型的学徒心态,他提出的比较研究立场在当时体现了一定的激进色彩^②。刘康后来回顾说:“当时我初出国门,在形形色色的西方思想之中,立刻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的而且是终生的研究兴趣。我想最重要的原因,是马克思主义与现代中国的关联。可以说,我在威斯康星大学学习的重要收获之一,就是发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葛兰西、阿尔都塞、巴赫金的线索。福柯对我的影响实际上也非常大。我1983年到美国的时候,福柯在美国的影响正是如日中天。虽然我在后来的论著、论文中很少对福柯做专门的研究,但是福柯的谱系学方法、话语权力、知识权力理论实际上是我构思很多论文的一条主线、一个重要的思考路径。”^[5]如果说大多数从事西方文论的华人学者主要从事西学的翻译与介绍,刘康则力图跳出单纯的冲击—反应或者传播—接受的译介思路,着眼于全球范围内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的生产、流动、影响及其理论关联,不遗余力向西方学界阐述毛泽东、瞿秋白、李泽厚等人的思想成就。这些思考后来汇聚在他的英文著作《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和他们的西方同行》之中^[6]。

(三) 文学的政治属性

文学有无政治属性、如何进行政治批评、文学研究能否超越政治,这是涉及文学与政治关系的三个基本命题,也是此次论争中双方分歧与冲突的理论基础,英美新批评和欧洲批评理论对此给出了对立的

① 孙康宜也曾指出全球化的趋势使美国传统的汉学研究受到了极大的挑战。

② 刘康站在中西比较的立场上研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关注当代中国的美学问题,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与方法,也为不断深化参照视角,力图在国际视野中反思中国当代思想与文化提供了重要启示。

答案。

第一,重新定义文学的政治属性。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内的作家和评论家试图通过观照语言或艺术形式的审美属性来消解政治在文学中的统治地位,“但这种审美化行为本身就是政治性的”^[2],实际上强化了文学活动具有政治性的观点,这是一种去政治的政治化。政治并非文学之外的因素,而是内在于学术或制度化的实践方式。从刘康的自我回顾中可以找到上述批评观点的思想线索,他说:“对我这个中国留学生来说,最吸引我的、让我觉得最熟悉的还是马克思这条线索。应该说我最初的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来自詹姆逊,他的《政治无意识》1981年出版之后立刻被美国学术界认为是一本划时代的巨著。我到美国读博士的时期,恰逢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对美国文学的主导模式即新批评造成巨大冲击。通过詹姆逊,马克思主义重新在美国成为一个受尊敬的研究领域,人们开始认识到意识形态和政治无处不在,而且意识形态和政治正是在文学审美形式之中表现出来的。”^[5]刘康对自己学缘结构的解释,说明了他与新批评学派之间在旨趣、方法、视角上的差异,从而也就解释了文学研究方法论价值取向差异的根源。

第二,西方学界政治批评的双重标准。中国国内学界的文学批评固然具有鲜明的政治化色彩,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当我们看到西方批评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评论和立场时,这一点就不那么明显了。西方批评家往往倾向于通过假设客观的、无党派的、多元化的观点来中和他们自己的政治立场。”^[2]刘康认为,这种所谓去政治立场实际上是一种假象,他直指西方学界文学研究中的双重标准,即一方面指责中国文学创作、批评和理论中的政治意识形态问题,但是另一方面,实际上西方批评者同样基于政治立场作出六经注我、为我所用的意识形态判断。刘康认为上述问题主要涉及的是对于“政治批评”或者“批评的政治”的理解,前者是批评角度与知识资源的问题,而后者体现的是文学批评中的话语权力。

第三,如何理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超然性政治态度。在《近代中国》这篇论文的最后,刘康开门见山提出:“我想在当前影响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后现代主义争论的背景下,提出一些关于政治的问题,这些问题构成了我上面所考察的主要批判模式的基础。第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能否保持政治上的超然,或至少追求超越政治分歧和历史隔阂的非政治的客观性和中立性?普适克和夏志清三十多年前的论争仍然是一个恰当的例子:他们之间的分歧主要源于对中国的不同政治观点,然而这两位评论家都倾向于将他们的立场从政治假设转移到关键程序的问题,并同样强烈地主张‘科学性’和客观性。西方关于现当代中国文学的批评作品往往对其所涉及的政治内容非常不满,却很少意识到自己的政治偏见”^[2]。刘康认为研究者无法回避文学的政治态度与立场,但是有必要对于何谓政治、何种立场、何以成立进行自我反思性质疑与批评,从而走出视角的僵化与立场的偏执。总之,在此论争中刘康认为,“提出以下问题是合理的:聚焦于文本的政治批评和介入事件世界的政治批评之间的界线在哪里?批评还能像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家和法国新理论家所选择的那样,被锁在文本、语言和美学的理想主义飞地里吗?如果不把这种中国经验考虑进去,后现代主义的政治论争是不完整的。因此,这个经验不能再作为一个永恒的他者;某种文化和政治的归属和参与似乎是不可避免的”^[2]。从事后之见而言,刘康当时对美国学界范式危机提出的问题,与21世纪以来国内主流意识形态力求在学术命题、思想、观点、标准、话语能力和水平等方面确立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二者的诉求是相通之处的,那就是确立中国话语在国际学界的主体性地位。

(四) 西方文论的中国问题

在多年后的访谈中刘康说道:“如果就我们这代知识分子而言,我们实实在在是从五四以来的感时忧国的一代。……无论我们身在中国还是在海外,这种‘关心国家大事’的情怀,难以改变。”^[7]带着这种知识分子经世济民的情怀,刘康以积极的心态参与美国及中国学界的各类学术会议,在各种平台发出中国的声音,持续不断对文学理论与范式进行挖掘和探索。刘康关注西方文论的同时,时刻带着中国学人

对于中国文学研究的问题意识。“我们能从当代的理论和争论中得到什么?近年来的批评研究,如安德森的《现实主义的限制》,把批评的中心放在中国现代作家对西方文学的挪用和推崇的内在机制中来考察现实主义的形式,及其伴随的冲突和矛盾,而不是讨论中国文本与西方大师文本相比的不足或失败。这指出了方向,在这个方向上差异、差异性、异质性问题开始在批判性研究中占据中心地位。”^[2]詹姆逊的《政治无意识》和其他西方学者的著作作为解释中国文学与文化现象提供了深刻的洞见。文学研究作为一种学术实践如何处理与理论的关系?这是此次论争的重要议题之一。刘康毫不隐晦指出理论的价值与功用以及具体的利用方式:“我们研究中国现代文学需要新的理论和概念,因为当我们将差异、互动和对话理论化时,我们肯定会从一些理论预设开始。从这个意义上说,害怕在中国文本研究中获取西方理论是错误的。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我们能否用西方的理论或西方的标准来理论化中国的东西,而在于我们能否在历史的间断性和异质性的背景下看到我们的理论尝试中的漏洞。(在这一点上,最近的批评理论对批评和解释的自我反身性的洞察无疑是有帮助的。)”^[2]在后来的文学理论批评实践中,刘康重点开展了中西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比较研究。他回顾道:“我从詹姆逊开始按图索骥,找到了对詹姆逊影响至为深刻的阿尔都塞,然后发现阿尔都塞实际上是整个西方20世纪60年代各种激进思潮的一个枢纽、源头或‘话语开创者’(founder of discursivity,这个概念的发明者福柯就是阿尔都塞的弟子)。更重要的是,我立刻就发现阿尔都塞的思想与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阿尔都塞将中国和毛泽东纳入他的理论的核心,因而成为超越东西方现代马克思主义的一座思想桥梁。除了阿尔都塞之外,在这时期我还开始着手研究巴赫金、葛兰西,并且开始梳理中国现代左翼美学理论的发展。从鲁迅到胡风、瞿秋白到毛泽东、朱光潜到李泽厚,一路梳理下来,越来越发现中国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惊人相似性。”^[5]刘康的上述思路在近些年来得到了进一步的延续,其可行性与学理性并非没有争议,正如此次论争中受到杜迈克、林培瑞和张隆溪的激烈批评。

二、美国知识界人文学科的断裂

刘康曾经回顾1993年三位美国学术权威跟他的辩论:“那时我是个刚出道的年轻人,有了意见就讲,也是性格使然吧。我当时研究的是中国现代文学,但我却讨论很多关于政治、意识形态的东西,被不少人认为是不务正业。我那时就不想局限在纯文学的领域,而是希望有一个包含政治的、文化的更为广泛的领域,所以后来就越来越多地介入到社会科学领域中来。”^[7]笔者认为,美国人文社科学科之间的分化、断裂与跨越是理解上述争论的观察点。张英进将英文学界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创立时期(1951-1963年)、成长初期(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发展盛期(20世纪90年代至今)^[8]。他认为:“现在来看,美国的《近代中国》杂志在1993年发表了致力于‘中国研究中的范式问题’的争论,其中显现的向西方理论靠拢的倾向标志了又一个学科发展的断裂时刻。”^[8]而这一断裂时刻某种意义上是美国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走向成熟与自信的结果,也是进一步拓展边界、增加议题的必然要求。因此,所谓学科的断裂与危机未必完全是坏事,其中蕴藏着革新的机遇。

(一) 美国汉学传统的流变与学科关系的错动和整合

如果说刘康对夏志清、李欧梵、普实克的学术批评反映了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方法论的学科分歧的话,那么,传统汉学也从“把中华文化当成博物馆藏品来钻研”这种猎奇的求知兴趣,转向汉学圈子外的其他科系范围,并寻找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整合。耶鲁大学孙康宜教授认为:“随着美国比较文学范围的扩大,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汉学渐渐成了比较文学的一部分。因此,有些汉学家一方面属于东亚系,一方面也成了比较文学系的成员。尤其是,一向享有盛名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MLA;现代语文学会)开始设立‘东亚语文分部’(Division on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这样一来,‘汉学’也就进入了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然而刚开始时,所谓中西比较还是以西方文学的观念为基础,因此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大多偏重中西本质‘不同’的比较。例如研究中国文学是否也有西方

文学中所谓的‘虚构性’(fictionality)、“隐喻”(metaphor)、“讽喻”(allegory)等课题。另外有些年轻的比较文学兼汉学家,他们则向这种‘比较’的方法论提出挑战,因为他们认为,强调本质差异很容易以偏概全。”^[3]孙康宜在普林斯顿大学博士班接受的正统“汉学”教育(文史哲不分家,经史子集,教授们各显其能),一直把“汉学”看成一个独立的领域。她毕业之后来到耶鲁大学工作,只见到少数教中国文学的两三位同事,走廊上所遇者多为英文系、俄文系、阿拉伯文学系等其他语种的教授。耶鲁设有的“东亚研究中心”(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提供不同科系的老师和学生申请有关东亚研究方面的经费,同时也是举办各种活动的大本营,但它并不是一个所谓的系。多年后孙康宜回顾道:“不知不觉中,才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学术道路已迈向‘全球化’的方向。与此同时,我也注意到其他许多美国大学的东亚系,虽然并没改变它们原来的结构,也慢慢发展出不少跨系的新研究领域了。当然,我并不是在说,耶鲁那种以‘学科’为主(而不以‘区域研究’为主)的倾向直接造就了美国汉学的新方向,但耶鲁的特殊教育结构显然与美国汉学这二十多年来的全球化趋势不谋而合。”^[3]从以上孙康宜所述的耶鲁案例来看,传统的汉学研究受到全球化时代来自欧洲尤其是法国和德国批评理论的冲击,因而原来的区域研究中的比较文学研究、文化研究与批判理论大行其道。

(二) 杜迈克对人文学科区隔的分析

杜迈克的回应论文首先肯定了刘康论文的价值,认为他展开了“一个令人振奋的讨论,提出了许多有关该领域现状的重要问题”,尤其值得称赞的是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带入“后现代文化和文学的全球辩论”。并且“在文章中投入了大量的知识和道德激情。他还试图公平地对该领域的多位知名学者赞扬和批评。他们要么受到表扬,要么受到指责(有时两者兼有)”^[9]。杜迈克很赞成刘康力图对中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史研究的方法论或成果持公平的立场。然而,他也严厉批评了刘康的观点,认为他使用了后现代的话术,观点不清晰,论证不明确。杜迈克指出,“其中一些观点也令人困惑或矛盾”“其中一些根本无法得到支持”^[9]。他认为,相对于新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而言,现代文学的“自由和人文主义的批评家更可能继续提供对文学的美学精髓及其与‘中国经验’的意识形态联系方面更精确的评判”^[9]。针对刘康的主要观点和提出的问题,杜迈克的逐条回应具体如下:

第一,针对美国学者为何不从政治角度来深入讨论中国现代文学,为什么中国当代批评者的新成果没有办法解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范式问题的原因,杜迈克认为,国外的学者对某些陈词滥调和官方说辞并没有兴趣。政治固然重要,但也不能强求美国研究者与中国知识分子一起感同身受,因为外国知识分子并不能真正理解中国的政治。

第二,刘康并不真正理解美国 1950 年以来的中国文学研究,所以作了一些比较武断的归纳。

第三,刘康反对夏志清的欧洲中心论,但他所赞同的几个学者所采用的都是欧洲的理论,或新马克思主义或后结构主义或新弗洛伊德主义。刘康反对李欧梵用“浪漫的一代”来分析五四知识分子,认为这不能解释五四时期的“现实主义”,但刘康提出的“现实主义”同样无法完全用来分析五四知识分子,因而这种批评是片面的。杜迈克进一步指出,刘康所反对的欧洲中心主义和精英主义,实际上是受到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第四,杜迈克强烈抨击刘康确信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有某种正式的研究方法,而并没有理解文学的本质。杜迈克指出,“文学总是关心持久的道德问题和价值之间发生的冲突,在人类个体的生活体验——爱与恨的普遍的人类情感,人类普遍自我和他人之间的冲突,人类与自然,人类普遍困境中的善与恶”^[9]。杜迈克的学术观点来自冷战时代的中国研究领域,而中国研究是以反共模式为主导的区域研究的一个亚领域(区域研究的核心领域是苏联研究,其主旨是“掌握敌情”),他对刘康的批评固然跟他的冷战立场有一定的联系,但是,同时也要看到,他对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历程有更为深入的了解,认为美国学者的这种“外国文学”研究在观点、趣味、方法上有一定的优越性和独特性,是不应该简单抹杀的。任

何一种文学理论都有一定的合理限度,并不能因此而简单、绝对否定其他理论的价值。从人文主义传统来看,文学的关怀体现在对于人类普遍道德与价值的守护,它是人类良心的救赎,也是希望的呼唤。

三、批评理论与新批评之间的分歧

1993年刘康发起对中国现代文学新范式的讨论,提出重新界定政治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试图就建构新的理论范式与包括华裔研究者在内的美国研究者探讨这些问题。刘康说:“从思想史角度来看,我这篇论文引发的论争,其实涉及到北美的中国研究的不同范式之间的根本差异和冲突。当时美国的中国研究学者普遍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特别是左翼文学基本没有文学价值,不值得当作文学来研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毛泽东思想也表示出轻蔑的态度。而这种研究取向,在当时是主流的、压倒性的范式。而我研究中国问题的路径,一开始就不是汉学的或中国研究式的,我是采取从比较文学、比较思想史、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中发展出来的重视文学、美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重视中国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比较、重视中国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建构自身独特现代性道路的作用这样的研究路径。我的看法是,研究中国现代思想、现代文学,无论如何都无法绕开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和美学思想。我们必须重视作为中国现代文化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或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5]刘康与各位学者之间的论争分歧,来源于美国学界占主导地位的新批评(new criticism)与欧洲批评理论之间的碰撞,批评理论对前者在美国文学领域权威性的主导地位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导致文学理论版图的巨大变动。

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的新批评流派统治了美国文论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这一理论直到60年代才逐渐式微。“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各种新思潮、新方法从欧洲大量涌入,美国文学批评的总体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随着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现象学批评、阐释学和接受美学的盛行,不仅彻底打破了新批评派的一统天下,而且美国当代文学批评也日趋多元化。在这种情况下,新批评派逐渐走向衰落几乎是不可避免的。”^[10](P293)但是它仍然给美国文学和文学批评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影响。经历过这一范式转型的加州大学奚密教授介绍过欧美学科理论转换之间的矛盾与纠葛:“在欧美,美学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兴起于18世纪,文学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新批评主义’是对传统历史主义的革新,也开了欧美文学理论的先声。它提出的‘批评理论’(critical theory)和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同名观念有不同的意义。当代理论,在文学研究的领域里,可说是对新批评主义的批判。”^[11]正如张英进所说:“随着20世纪60年代来自欧洲的批判理论的出现,新马克思主义启发下的意识形态批评逐步开始扭转北美学界,在那里新批评对于文学完整性和天才作家之审美杰出性的强调迅速失势。”^[8]文森特·里奇引用批评史学家威廉·凯恩的话指出,即使“新批评”的思潮已经在20世纪50年代末消退,但它却给后来的文学批评留下了一个所谓“标准的批评”的概念,文学批评家们会不自觉地“将‘新批评’这种纯文学批评理论当作一个既定的自然而然的前提条件”^[12](P27)。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胡志德(Theodore Hutters)教授也回顾了美国学术界的这种理论更迭的潮流,他认为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发展到文化研究,文本逐渐失去它的中央位置,文学研究日益粗糙。文学研究的独特性也逐渐丧失,令他感到忧心忡忡。在这个理论挂帅的时代,许多人迷失在幽深的理论术语迷宫之中,忘记了细读文本才是文学研究者最基本也最重要的功夫。他以鲁迅研究为例说:“鲁迅的复杂性是哪里来的?是他的文学,不是他的人生。从他的人生切入没意思,我们记得鲁迅不是因为他过的那些日子,还有他跟弟弟吵架。没错,鲁迅是跟他的弟弟吵过架,但我们记得他不是因为那些事,而是因为他的思想、他的文学,不要忘记焦点是什么。”^[13](P105)关于批评理论对文学研究的冲击,林培瑞与胡志德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他对于学术现状也颇有微词,尤其是针对后现代主义理论等新的西方理论反感尤甚。林培瑞对刘康的批评与他对新批评立场的坚守是一致的:“我觉得这些在美国的学术界象牙塔里面时兴的时髦语言,坏处相当大。那种时髦语言我很反感,因为我看见过不少研究生,尤其是台湾、大陆来的研究生,因为文学文本都读过了,甚至中文读得比他的洋人老师快,那么来美国学什么呢?就

学这种表演语言游戏。你把本来的一些想法说得很漂亮,文法都对,但是你究竟说明了什么问题?变成次要的,甚至于不知道。我觉得不只是中国学生,很多外国学生、外国老师都是一样,他们关心的是时髦不时髦,文法对不对,用的词是不是最流行的、最时髦的词,而不是在学术上我在哪儿进了一步,有什么新的结果。”^[14](P91-92)他的批评毫不留情,矛头所向是有明确所指的。其次,林培瑞觉得惋惜的是汉学界里的“殖民主义”。“因为所有的文本都是中文的,所有的理论都是欧洲的,然后学术是什么呢?是把所谓的‘高级’理论套到中文的文本上,从来没有人相反地想过。”林培瑞举例道,“比如你可以用中国文学的概念应用到英国的狄更斯之上,完全可以这样做,但是没有人做”。已经过世的斯坦福大学教授刘若愚是林培瑞相当佩服的学者,他认为刘若愚写的《中国文学理论》根据一些古代文本,分析出六种中国古典的文学观,“百分之百是用传统中国的土壤归纳出来的,而且分析得很清楚,很好”^[14](P91-92)。针对理论绑架文本、研究悬空文学的乱象,林培瑞主张文学研究应该回归到更扎实的文本分析:“对于理论我是欢迎的,但是对文本应该有实际的、清楚的分析,不要玩语言游戏。现在很多文章连作者自己也说不清他写的是什么,这个我觉得过分了。理论要是有用的话,当然要用,但是不要学一套不说明问题的语言,不要为理论而理论。”^[14](P93)林培瑞在美国学者中以积极参与各种针对中国的政治听证、媒体评论著称,在跟刘康的论战中,他以文本中心的新批评方法论的捍卫者面目出现。平心而论,批评理论确实可以给文学研究带来新的视角和解决方法,也可以使文学细读不再局限于文本本身而有更深的历史与社会纵深,理论的介入可以使文学分析不再拘泥于就事论事而是可以抽象出一般性的思想命题。同时,也不可忽视的是,理论的运用有可能带来意识形态先行、生搬硬套、削足适履、以偏概全的弊端。关于批评理论与新批评的论争,笔者认为无法得出一个存废与是非的结论,毕竟任何一种方法论的出现既有学科自身逻辑的演变,又有社会与历史条件的影响。新批评学派并非简单反对理论,毕竟他们使用的细读方法本身也是一种文本中心主义的产物。问题的关键在于,文学研究首先是文学性的研究,文学并非政治影响的直接结果与反应,文学的特性在于使用语言、情感与形象的方式进行言说。其次,文学研究作为人文学科的组成部分,其知识资源来自不同的学科,因而并不回避理论的视野与建树,关键在于如何运用理论,分寸如何把握。研究者有必要警惕偏颇的意识形态模式造成文学与理论的本末倒置,以至忽略和抹杀文学性。

四、文学研究与理论的关系问题

究其根本,全球化背景下亟须被重新确定本质的中国现代文学及其与西方理论话语的关系,构成了这场争论的张力和焦点。阐释中国文学的焦虑以及运用何种西方理论进行阐释的困惑,始终萦绕在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的心头。笔者认为,杜迈克、林培瑞、张隆溪等学者围绕理论和文学的本质问题,围绕“第三世界的文学和理论”问题充满着困惑和焦虑,他们关心的问题在今天依然需要被正视并重新解决。

(一) 文学批评与个人体验

针对刘康认为“政治在所有文学和文学批评中渗透”,并视之为“当代文学理论和后现代主义的文化问题辩论的基础”这一观点,张隆溪认为:“虽然充分认识到批判理论的重要性和特殊的知识教化作用,然而,我想重申用实践经验来检验理论的必要性——阅读的经验和社会现实的经验。理论和实践不一定是互相矛盾的,但也不一定是一致的。只有通过考察它们之间有问题的关系,我们才能超越纯粹经验主义的局限以及纯理论的经院哲学”^[15]。张隆溪从具体的历史语境与经验出发,认为“政治从来不是学术意义上的分析和讨论的对象,而是由国家权威来定义的”。他认为,应该警醒的是完全政治化的视角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政治固然无处不在,“政治渗透一切的主张导致了公开宣称的政治至上,导致了国家权力的垄断,使得一切,包括文学和批评,都屈从于少数统治者的利益,成为极权政治的主宰”^[15]。他的理由是,“对经验的依赖在文学和文化研究中具有解释学意义;它与反理论立场无关;相反,它提供了一个

真正理论立场的基础,即一个并非无视其本身的关键假设的立场,能够使理论不是作为教条,而是作为一个强有力的分析和批判的工具”^[15]。张隆溪与刘康同样作为比较文学学者,其知识背景与生活经历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他们的主要分歧在于,前者带着深刻的个人体验从事文学研究并凝聚为关于文学本质的理解,其判断和认识也带有深刻的个人痛苦印记;后者认为文学与社会的政治性无法消除,政治无处不在,可以通过再政治化重新审察微观权力的运作方式。

(二) 林培瑞对批评理论的反思与批判

林培瑞对刘康的论文进行了长篇幅的回应。首先,他回顾了美国的现代中国文学学者对于理论在接受心理,从而对刘康的观点形成“同情之理解”。20世纪60年代,现代中国研究以跨学科的“区域研究”方法为主,“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尤其到80年代,仅仅把文学文本作为历史资料来源的不充分性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从实际意义上说,这一重大转变是该领域规模增长的结果”^[16]。现代中国文学领域的学者开始越来越多地阅读西方批评和理论,林培瑞具体分析了他们在接受批评理论时的心态。“一开始,这种努力让人感觉像是‘迎头赶上’,有些人甚至对他们在中文系接受的研究生训练感到不满,因为他们没有在文学分析技巧方面做好准备。但最常见的反应是新鲜的兴奋:我们现在可以重新审视整个领域,把文本当作艺术作品来分析,而不是历史报告。我们可以用西方文学理论来重新审视支撑中国写作和我们自己的写作方法的假设;通过比较文学,我们可以拓宽自己的视野,就像我们的欧洲同行一样。”^[16]1980年代这一领域的另一个重大影响来自大西洋彼岸的思想和学者的汇合,从欧洲主要是法国产生了“批评理论”,它不仅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也影响了美国的整个学科,包括文学、人类学和一些历史学分支。对于来自中国大陆和港台的学生来说,批评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有着特殊的吸引力,它激发了美国以及包括港台在内的中国学生普遍的兴奋情绪。

其次,对于批评理论这一论争焦点,林培瑞认为,不可否认批评理论是纯粹西方的东西,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希望吸收这些理论以成为一种对抗旧有知识的资源。批判理论是最新的理论成果,甚至在西方也是如此。20世纪70年代末,当中国对外开放时中国学者从思想禁锢中得以解放,最引人注目的进步是技术方面,在这个领域任何最新的东西显然都是最好的。然而,林培瑞认为,“如果没有充分认识到人文主义理论并不能像科学技术那样可靠地显示出线性的进步,而且在当代西方,人文主义理论有时只能在非常有趣的圈子里进行——中国学者倾向于认为批评理论位于西学的顶峰”^[16]。显然,林培瑞认为中国学者走入了未经反思批判而盲目追逐的误区,他对此极为反感。他认为,“花大力气去检验批判性理论的基本假设——即剖析自己和同事——很容易导致过度的自我专注,从而把注意力从文学作品上转移开。在文学领域发表很少或根本不涉及故事、戏剧或诗歌的文章已经成为可能”^[16]。对人文主义、实证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等观点的过于浅显的关注培养了一种研究主体处于关键地位的感觉。如果选对了就不会留下空隙。然而,他指出,研究传统中文学关注的是难以捕捉的生活的丰富性,这种生活的丰富性不符合任何主义和立场的轮廓,无论它们是如何被构想出来的。最明显的是时髦却草率的语言问题,尽管这并不仅限于来自中国的学生(毕竟不是他们发明的)。随着批评理论潮流的变化而变化的理论,在他们中间成了一种模仿的对象,即使其基本思想并不新鲜^[16]。林培瑞批评中国留学生对西方理论粗枝大叶消化不良、理论先行简单套用,这一问题在今天尤其值得国内学者警醒。

五、结语

张英进在同一时期对这一论争进行了精辟而中肯的概括。他认为,杜迈克和林培瑞持“自由和人文主义的立场”,基本上以文学抵抗或排斥理论,以中国经验对应西方理论;刘康持“激进和抵抗的立场”,以西方理论解释中国文学和历史,其中国经验内涵的政治(或思想)大于文学(或美学);张隆溪持批判和自我反思的立场,立足中国经验,借鉴西方理论,回旋二者之间而不失独立的批评眼光,既不拒他山之石,也不恪守常规,更不人云亦云^{[17][18]}。从夏志清、杜迈克到林培瑞,他们的文学观都跟英美新批评

的文本中心论一脉相承,而政治观则跟美国当时的冷战大氛围、中国研究的意识形态模式高度吻合。所以杜迈克、林培瑞针对刘康关于新批评理念与冷战理念的双重挑战作出的回应十分相似,也就不足为奇了。而作为华裔学者的张隆溪,基于他的中国经验与记忆,在跟刘康的辩论中持强烈鲜明的批判立场^①。但他对于经验的解释学意义的重视和对文学理论政治化的高度警觉,现在看来则构成了两位华裔学者关于经验、实践和理论预设关系的对话,其意义超越了新批评/后现代理论、冷战/社会主义的二元对立。

1993年的争论也许宣告了“理论时代”的到来,在这一时代里不同类型的意识形态批评相互竞争夺取话语控制权^[19]。刘康的论文折射了某种时代需求与思想症候,他的基本观点反映了美国学界学术研究存在局限与问题,撬动了新批评似乎不可动摇的权威地位。批判性地考察20世纪90年代这场学术争论,对于中美两国来说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本文通过分析和讨论美国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内在逻辑与分歧,试图为国内的文学研究者打开国际对话的窗口,并且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思想语境中继续深化其中核心命题的探索。《近代中国》1993年的争论迄今已近30年,所引发的理论焦虑一方面推动学者内部的积极讨论,另一方面也促使不同学科沿着更为激进的方向构建新的思想话语。最近几年来,刘康又在中英文学界发起了“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的讨论,目的是梳理中西文学理论、思想和学术史的脉络,把握现代中国“译介开路、借用西方”与“以西人之话语,议中国之问题”的轨迹^{[20][21][22][23]}。当今全球进入了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每个学者都代表着各自不同的声音,中西学术理念之间固然存在差异,但不同文化也在走向对话、互鉴与融合。反思学术史上的焦点与对话,可以为激发新的学术生长点提供参照与思路。

参考文献

- [1] 张英进. 从文学争论看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范式变迁. 文艺理论研究, 2013, (1).
- [2] Liu Kang. Politics, Critical Paradigms: Reflections o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 *Modern China*, 1993, 19(1).
- [3] 孙康宜. 谈谈美国汉学的新方向. 书屋, 2007, (12).
- [4] 李松, 余慕怡. 海外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中西比较和思想建构. 文艺理论研究, 2018, (1).
- [5] 刘康, 颜芳. 中国的世界, 世界的中国——刘康教授访谈. 学术月刊, 2020, (2).
- [6] Liu Kang. *Aesthetics and Marxism — Chinese Aesthetic Marxists and Their Western Contemporaries*. Durham: Duke UP, 2000.
- [7] 陈菁霞. 刘康: 割舍不去的中国情怀. 中华读书报, 2010-10-13.
- [8] 张英进. 五十年来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的英文研究. 文艺理论研究, 2016, (4).
- [9] Michael S. Duck. Thoughts on Politics and Critical Paradigms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 *Modern China*, 1993, (1).
- [10] 杨冬. 文学理论: 从柏拉图到德里达.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 [11] 奚密. “理论革命”以来的文学研究. 书城, 2004, (12).
- [12] 文森特·里奇. 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的美国文学批评. 王顺珠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 [13] 胡志德. 走出“五四”, 寻回近代——专访胡志德教授//郑文惠, 颜健富. 革命·启蒙·抒情——中国近现代文学与文化研究学思录.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
- [14] 林培瑞. 灵魂深处闹革命——专访林培瑞教授//郑文惠, 颜健富. 革命·启蒙·抒情——中国近现代文学与文化研究学思录.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
- [15] Zhang Longxi. Out of the Cultural Ghetto: Theory, Politics, and the Study of Chinese Literature. *Modern China*, 1993, 19(1).
- [16] Perry Link. Ideology and Theory in the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 *Modern China*, 1993, 19(1).
- [17] Zhang Yingjin. Reenvisioning the Institution of Chinese Literary Studies: Strategies of Positionality and Self-Reflexivity. *Positions*, 1993, (3).

^① 张隆溪与刘康的辩论扩大、延展到了汉语学术界,二人在香港学术期刊《二十一世纪》你来我往,有多次交锋,受到广泛重视。他们的论战后来收入了汪晖、余国良主编的文集《九十年代的“后学”论争》,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8出版。

- [18] 张英进. 从文学争论看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范式变迁. 文艺理论研究, 2013, (1).
- [19] Rey Chow.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in the Age of Theor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Books, 2001.
- [20] 刘康. 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一个思想史的角度. 社会科学, 2020, (4).
- [21] 刘康, 王宁, 曾军等. “批评理论的中国问题”研究专辑. 文艺争鸣, 2019, (6).
- [22] 刘康, 李松. 文化研究的西方资源与中国实践//周宪, 陶东风. 文化研究: 第31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 [23] 刘康, 李松. 中国研究、后殖民主义及身份认同——刘康访谈录. 文艺争鸣, 2018, (9).

Paradigm Crisis in the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Debates and Reflections in American Academic Circle

Li Song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Since 1980s, the theoretical revolution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has strongly impacted the original mode of literary research and profoundly influenced the layout of humanities and the reform of academic system. In 1993, Liu Kang and other scholars launched a debate on the paradigm crisi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research in the American journal *Modern China*. This debate reflected the methodological conflict and the rupture and adjustment between disciplines of literature research within American Sinology. The main topics of this debate are: the comparative study on Chinese Marxist literary criticism and the Western left wing, the political nature of literature, the Chinese problem in Western literary theories, the rupture of disciplinary relation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critical theory and new criticism,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ry research and theory. Reviewing and reflecting on the internal logic and differences in the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United States can help open a window of international dialogue for domestic literary researchers and deepen the exploration of core propositions in the new historical conditions and ideological context.

Key word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modern literature; new criticism; paradigm; sinology; literary theory

■ 收稿日期 2020-05-20

■ 作者简介 李松, 文学博士, 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湖北 武汉 430072。

■ 责任编辑 何坤翁